



印光大师之家教思想



牛飞雁，男，汉族，1964年12月出生于枣庄市台儿庄区。现供职于枣庄市市中区国税局，酷爱古典文学、戏曲及佛学。曾任枣庄市国学教育促进会副会长、枣庄市市中区佛教协会副秘书长、枣庄市佛教文化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等职。著有《多音字辨误举隅》《孝经浅注》、《弟子规诠释》、《汉字百例儒释道三家经典笺注》及《观经四帖疏直解》等。

印光大师（公元1861—1940年），民国四大高僧之一。弘一大师李叔同视为挚交，仰其德能；而论其道德学问、智慧修养，梁启超先生则谓其“三百年来，仅此一人”而已。师虽专修净土，一门深入，而儒佛并弘，三教同赞。尤将家庭教育在在叮嘱，耳提面命。观其家教思想，概分有四：一曰注重伦常，二曰注重因果，三曰注重母教，四曰注重早教。

一曰注重伦常者，世无一人超乎伦常之外，亦无一人不在伦常之中。五伦之大，尽诸四海。曰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主仁仆忠。果能人各如是，则家门兴盛，子孙贤善矣！“家庭教育，最初即以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（《佛学救劫编序》）及至初开知识，即为彼讲说做人之理。如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等，否则任性骄惯，养成败类，纵有天姿，亦不知读书为学圣贤，则读书愈多人品愈坏。《复永嘉某居士书四》则曰：“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与《大学》欲治天下国家者，必从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而起，同一臭味。此儒门教人希圣希贤之无上秘诀，舍是而求，皆其末耳。”能教子女以成贤善，便是不据位而从政，功莫大焉！是以子曰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”

二曰注重因果者，即戒慎恐惧，知所不为；战兢惕厉，临深履薄。譬如《教诲浅说序》云：“使知声而则响顺，形直则影端，种瓜则得瓜，种豆则得豆，既造如是因，必感如是果，决不至为求自己安富尊荣，致令杀人盈城盈野，以及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也。”《复卓人居士书》又云：“以因果报应，能制人心。除此之外，任凭何法，皆无救药。以心不改良，则一法才立，百弊丛生矣！”是故曰：因果者，乃辅助教育之要道。“自孩提以至白首，自一己以至社会，自为人

以至为圣贤，自修身以至平天下，均须依之而得成就。实为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、度脱众生，成始成终之大权；标本同治，凡圣共遵之大法也。”（《劝世白话文发隐序》）

三曰注重母教者，以“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，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”。世少贤人，皆因世少贤母之所致也。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……而家庭之教，母教最重要，以人之性情，资于母者最多。居胎则禀其气，幼时则习其仪。其母果贤，所生儿女，断不至于不肖。譬如熔金铸器，视其模即可知其器之良否，岂待出模方始知之哉！”

（《石印闺范缘起序》）而《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》又云：“故曰教子为天下太平之根本，而教女为尤要。以人之幼时，专赖母教。父不能常在家内，母则常不离子。母若贤慧，则所行所言，皆足为法。见闻已熟，心中已有成规。再加以常常训诲，则习已成性。如熔金铸器，模型若好，器决不会不好，以故教女比教子尤为紧要也。”

四曰注重早教者，以周之开国，基于三太；而文王之圣，始于胎教。凡女人受孕之初，务必居心动念及行事，唯诚唯谨，一举一动，不失于正。《易》曰：“蒙以养正，圣功也。”古语云：“教妇初来，教儿婴孩”；“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。又曰：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”少时栽培成性，如小树标使壁

直。至其长成，欲令其曲，不可得也。“若小时任性惯，概不教训，大了不是庸流，便成匪类。”（《一函遍复》）必须存好心、说好话、行好事、做好人，一言一行，为贤为善，有利于家国，无害于自他方可。尤宜诫之以颜渊之“四勿”，曾子之“三省”，是故“遗子黄金满籺，不如教子一经。”

师虽方外高僧，犹系世间群黎。于家教之日用云为，不烦纓缕，反复叮咛。“古人所谓，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者，以天下人材，必从家庭中出。家庭有善教，自然子女皆贤善。家庭无善教，子女之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；无天姿者，狃于顽恶，二者皆为国家社会之蠹。是知家庭教育，乃治国平天下之根本。”（《劝世白话文发隐序》）由是言之，家庭教育不可不早、不可不慎、不可不从德行入手也。若常得贤母教之，善书辅翼之，自可意诚心正，明明德、止至善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即天姿平常者，亦可循规蹈矩，断不至越理犯分，为非作奸，以忝所生，而为世害也。

“国家人才，皆在家庭，倘人各注重家庭教育，则不数十年，贤人蔚起。人心既转，天心自顺，时和年丰，民康物阜，唐虞大同之风，庶可见于今日。是以忧世之士，莫不以提倡因果报应，及家庭教育，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据。”（《石印闺范缘起序》）大师之言，理事圆融，字字警心，敢不借镜体察，依教奉行也哉！

与书结缘

□ 刘永久

忆往昔，家境拮据，生活贫寒，小学三年级时，5毛钱的学费还得等到卖了“麻杆子”（一种能取皮制绳索的植物）才能还上，别说再买课外读物或其他书籍了。看今朝，衣食无忧，生活温馨，家中四个书橱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书、杂志。读书、买书、藏书，已成为我的一大嗜好。说心里话，这辈子能与书结缘，感觉真好！

随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，福利待遇的不断提高，求知欲望的不断升级，购书、买书的消费也愈加大方，日积月累，家中书橱内各式各样的书、杂志，渐渐地多了起来。

在我的众多书中，还有一群“特殊”的书籍——由人民日报社出版发行的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实务全书》上、中、下三集，不仅收编了我的一篇反映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通讯稿件，而且，还将我纳入编委序列。同时，由中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大地丰碑》、《中国人大年鉴》，由中国散文家协会出版的《大地的呼吸》；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骄子》等书籍中也都收编了我的许多稿件、诗歌、言论等。看着这些书或杂志，看着自己的作品，有时就感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更有一种异样的梦幻，是真的、真的、还是真的吗？相对我这个连初中都未上完的高小毕业生，一个才疏学浅、出身贫贱、知之甚少的农村娃来说，能有稿件见诸报端，能与基层一线宣传工作结缘近30载，有时还能和有识之士、编辑老师一起交流，已经不错了。虽是草根一族，却自我感觉尚好；虽没有功成名就，却有个人名字已进入书页，变成了铅字。哈哈，与书结缘，实乃俺人生之幸事、价值之体现、成功之骄傲。

平日里，难得空闲，回到家里不由自主地来到书橱前，随手抽上一本书或杂志，欣赏着自己的“爱书”，品读着编辑老师斧正后的见报、见书、见杂志的每一篇稿件，欣赏着作者们的美文妙语，再泡上一杯浓郁的绿茶，一边汲取书中营养，一边细品绿茶的芳香，书香味、茶香味、编辑与作者推出的作品中的人情味，相互交织，甚感乐哉、悠哉、自在。说真的，这一生能与“爱书”结缘，确实太幸福了！

夫持玉笏妻种桑

——解读东汉名臣王良“克己恭俭”的家风

□ 孙忠强

时光掠过二十一世纪，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与206国道交汇处，水旱码头的独特地理位置，崛起了一座港航物流重镇——古邵。岂不知，这座经济重镇历史上也是文化名镇，东汉大司徒司直（相当于国务委员）——王良，就是这块土地上培育出的杰出代表，他以“克己恭俭”的特殊家风，彪炳史册，名垂后世。

《峰县志·乡贤列传》载：“王良，字仲子，东海兰陵（今峄城人）。”他历任东汉王朝谏议大夫、沛郡太守、太中大夫、大司徒司直，为东汉光武年间为数不多的名臣之一。

王良少年时期就刻苦好学，攻读经书，特别对儒家经典之一的《小夏侯尚书》下了一番苦功夫进行深入钻研。靠多年的勤学苦读，积累了较为渊博的学识，他成了一位当时造诣很深的儒家学者。王良学有所成后，一直在家设馆授徒，由于他的学识渊博，教授有道，一时名声大振，远近学子闻名而至，先后“教授诸生千余人”，为打造“兰陵多学”的地域文化而倾心沥血。

公元8年王莽篡汉，建立了

“新”朝政权。这个短命的政权连年穷兵黩武，严重激化了阶级矛盾，民间先后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“绿林”与“赤眉”起义，致使当时的百姓流离失所，饱受战乱之苦。王莽当政时久闻王良的饱学之名，屡次派人征召他入朝为官，封建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，使王良耻与“汉贼”为伍，坚持“寢病不仕”。

公元25年，刘秀恢复了汉王朝，史称“东汉”。建武二年（公元26年），时任大司马吴汉数次举荐王良进京任职，但他醉心于三尺讲台，甘为桑梓育桃李，无心为官，数次婉拒。建武三年，朝廷“征辟”王良为“谏议大夫”，俸禄八百石。“征辟”是东汉初年选拔人才的特殊制度，被“征辟”的贤良、方正之士，经过考试合格，均拜为郎，隶属于“光禄勋”，再经过铨第，即可补位为官。王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上了为官之路。

王良任谏议大夫后，“数有忠言，以礼进止，朝廷敬之”。迁任沛郡太守不就后，又征拜为太中大夫，参与研判朝廷政事，俸禄增至千石。建武六

年，升任为大司徒司直，辅佐大司徒处理朝廷官吏监察方面的事务。

后来，王良因病返乡休养。

一年期满后，朝廷又重召他回京任职。

赴任途中，王良病情加重无法前行，欲到荥阳的朋友家暂歇。朋友以“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，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”的理由不愿接见。王良自感羞愧，随辞官归隐，终身“以病为由”不再出仕。

但是王良的彪炳史册、名垂后世并不是他“贤良博学、寢病不仕、婉拒举荐、朝廷敬之、辞官归隐”的原因，而是他“在位恭俭，妻子不入官舍，布被瓦器”的特殊家风。这在“司徒使鲍恢访古邵”的故事中有真实的历史记载。

时任司徒使鲍恢奉命到东海郡出差，路过王良的家乡兰陵。他知道王良夫人一直留居农村老家，过着自耕自织的农家生活，特意到他所在的村庄（今古邵镇驻地）看个究竟。当时，他见一农妇一身粗布衣裙打扮，还背着一捆柴草，正好从田地里回家。鲍恢忙自报家门，“我是京

城来的司徒使鲍恢，与王良大人是同僚，今路过贵地，特地来拜见王夫人，问可有书信捎带？”农妇答道：“我就是王良的夫人，有劳大人登门问讯，没有书信捎带，烦请转告家中平安。”鲍恢急忙下拜，心怀感叹，不禁肃然起敬。他回到京城后，将所见所闻如实地告诉了同僚们，众人无不深感钦佩。

建武二十年（公元44年），光武帝刘秀巡视到兰陵，特地派人到王良家中慰问病况，为褒奖他“克己恭俭”的家风，还下令免除了他子孙应承担的赋税徭役。乾隆四十四年（公元1779年），时任峄县知事张玉树，熟读史书，详察列传，为王良“夫持玉笏妻种桑”的优良家风所感动，特在今古邵镇驻地立石碑一通，亲书：“王良故里”四个大字。现残碑历经几百年风雨仍保存在当地，以资后人垂念。本土诗人鸿麟先生特作《谒王良墓》赞曰：

名动当时冠帝乡，夫持玉笏妻种桑。

一杯黄土春风里，千古至今说贤良。